

**政法学院课程考试论文**

现代货币、技术与生命

对齐美尔现代性理论的一种解释路径

课 程 名 称： 社会学理论 。

专 业： 社会学 。

学 号： 20181052113 。

姓 名： 李凌浩 。

成 绩： 。

阅卷教师签字： 。

2020年 月 日

现代货币、技术与生命

——对齐美尔现代性理论的一种解释路径

摘要：货币是齐美尔理论研究的主要线索之一。随着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逐渐引起了现代价值观的物质化，作为纯粹手段和符号的货币取代了生命内容。类似的追求手段和工具的完善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从而树立了现代社会中手段、工具与精神、生命的紧张。货币的介入改变了生命目的论的链条，对手段的追求重新为生命运动划定了界限，但最终，生命运动将谋求对以上两者的超越。可以说，现代社会内在紧张的根源在于生命表达和超越的周期性过程，齐美尔通过对现代体验的追问，解释了人类总体生命的悲剧性所在。

就齐美尔著作的顺序而言，《货币哲学》具有过渡性意义，承担了齐美尔从提出一种经验性社会学向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体系的转变，而其晚期则着眼于生命哲学或生命形而上学的研究（弗雷司庇，2000：199-200）。齐美尔以一种康德式的视角来说明现代性的症结：从被“神化”的货币经济着眼，现代人应该如何面对从文化到内在生命的紧张？这一点不仅在《货币哲学》内得到体现，在其1896年见刊的小品文（essay）《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中就已提及：齐美尔将货币比作“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西美尔，2000：10）。人是无法栖居在纯粹手段的桥上的，但现代人却将金钱视为通向所有快乐的钥匙而孜孜以求（西美尔，2000：10），原本导向目的中介和手段本身被当成了目的。

这一担忧同样见于他另一篇著述《1870年以来德国生活与思想的趋向》中，在现代消费倾向和对技术的顶礼膜拜下，工具的客体性对主体产生了“根本反动”，社会的终极目标渐渐消解，一方面对技术完善的追求造成了生活的日益外化（externalized）；另一方面，现代人对一般社会问题的旨趣如泡沫般迅速膨胀而又旋即破裂，现代社会继承自基督教情感的对终极与绝对的渴望得不到满足，“生活没有了意义”（西美尔，2003b：196）。不仅如此，在齐美尔最后对生命形而上学进行探讨时，同样提到了金钱和货币，并且将金钱作为生命合目的性转变的例证。作为生命范围内的职能的金钱，本应“与其目的交织在一起”，反而成为了独立的目的本身，让生命为自己服务（齐美尔，2003a：33）。在齐美尔看来，人的生命本应超越一个通向行为和手段整体的总目的论的生命链条，而对金钱的渴望极大强调了这一链条的中间环节，由此，生命为的合金钱的目的性而服务，人被降格到了自由的对立面（齐美尔，2003a：33-38），人们需要重新审视目的本身。

对自己提出的货币体制和金钱影响的反思，齐美尔回应道：

如果这些形式上的相似性和深刻的内在联系[[1]](#footnote-1)促使我们将货币体制与我们文化中的所有成果看作同一个树根生长出来的枝条……我们的认识越接近那个树根，我们就会越清楚地看到货币经济与我们文化的阴暗面，同时也看到（它）与我们文化最精微和高贵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货币体制……自己能够医治由它刺破的伤口。（齐美尔，2000：16-17）

本文认为，齐美尔的生命哲学中的许多观点能够与他早期研究建立联系，其中货币及其演变是纵贯齐美尔经验社会学研究到生命形而上学研究的要点之一。货币作为纯粹手段和符号，可以被包含在生活的外在化趋势中，其在目的和界限[[2]](#footnote-2)上与生命形式的紧张关系可以为理解齐美尔的生命哲学提供路径切入，并且以货币为代表的现代困境，最终可以从生命的运动中溯源，并为生命超越所解决。本文尝试经由简要回顾齐美尔的货币概念和货币得以成为符号和纯粹手段的过程，并从技术和生命形式的紧张中对齐美尔的生命哲学观念做出简单的阐述和解释。

# 一、现代化中的货币

虽然齐美尔强调在现代文化和心理、气质上研究货币，但他的论述有时并不从文化的方面切入。齐美尔认为，现代与中世纪的最主要对立，在于现代社会达成了人的个性（Personlichheit）独立和组织、群体的“去人格化”，并且将这一分化称为“主体与客体相互独立”的过程（齐美尔，2000：1）。这种分化或者独立过程是由货币经济带来的，货币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经济时代人身和物权之间是紧密绑定的，一方面，存在财产捆绑人身的时期，表示一种人身的被占有和依附，另一方面，也存在财产直接附着于人身的形式。但货币经济使得货币能够对个人的人身做出替代，作为中介出现在人身和财产之间，人身的依附可以由货币进行赎回，而直接附着于人身的财产也可以转换成纯粹货币的形式而与人身分离，以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形式继续参与到经营中。并且，齐美尔还指出，货币带来的主客体的相互独立，也使人从直接依附于个人财产的简单、初级劳动中解放出来，最终导向一种市民社会式的每个人都为他人而劳动的经济统一体。货币由此制造了“渗透进所有经济活动的非人格性”（齐美尔，2000：3），同时把人身从与财产的直接捆绑中解放出来。

而这种客体人格色彩的去除和主体人格的提升有赖于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广泛而普适的“代表”，只有货币交换能够覆盖大多数种类的财产，成为“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齐美尔，2000：3），货币才有可能成为人身和物权之间的中介。故而，齐美尔对于货币的兴趣更多是非历史的，就货币最纯粹的意义——符号或纯粹手段——进行讨论。齐美尔对于货币产生的讨论也似乎是为了导出货币纯粹意义的迂回：货币的适用范围随着扩大的商品交换和流通进一步发展，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货币的“代表性”就越强，货币价值就越普适。于是，金钱价值正在取代其它价值形式而成为价值的唯一表达，价值最终成为货币的纯粹数量的价值，货币也成为数量价值的符号。这时，不存在除了货币价值以外的品质，人类文明中一切特殊的价值都可以为货币所“夷平”，不再具有除了金钱以外的任何含义。

货币对其他物品的这一过程同样作用在现代心理上。扩大的货币经济使得金钱可以换取任何东西，千篇一律又无所不达的交换让现代人用毫无差异的方式和观点对待一切。不仅对于商品，伦理道德领域的感受也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譬如用金钱赎罪（齐美尔，2000：9）。故而，人们首先将货币看成进行交换、获得其它物品的纯粹手段。但与货币“夷平”价值的过程相似，随着金钱的使用，所有物品都有其货币形式的数值表示，货币作为“通向一个最后目标和想用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环节”。而现代文明中人类的愿望“如此困难、复杂和遥远”，货币因其代表性而作为其中最显眼的环节，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实际的最终目标所在（齐美尔，2000：11）。另一方面，货币流通和试图受惠于货币的渴望又遍布社会各界，对金钱的追求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从而，金钱成为了“不受限制的目标”，作为纯粹手段的中介环节摇身一变成了最终目的。齐美尔对这种变化同样抱有担忧，不仅因为货币价值正在取代一些特殊而富有意义的价值、抹平高级和低级的差异，最终取消伦理和道德的限制，而且对金钱的追求最终会导向生命本身最终目标的缺失，人的生命探索止步于金钱。但金钱作为无特征、无色彩的纯粹手段，作为目标并没有实际的用处和意义，在对金钱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的只有生命的空无[[3]](#footnote-3)。

但回到货币本身来看，作为符号和纯粹手段的货币是支撑现代文明的一部分，货币成为不受限制的目标，实际上是较高程度的文明具有的目标为手段遮蔽的特征和问题（齐美尔，2000：10）。这一类问题不仅仅体现在货币这一件手段或工具上，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技术都有被看作最终目的的趋势。货币对现代心理的侵蚀和其与生命目的的紧张关系，是从属于技术（纯粹手段和工具体系）与生命形式的冲突的。

# 二、生活的外在化与现代技术

齐美尔强调主体在生命中的完善，但他并不看好现代文明在精神上的改进和发展，而是指出了现代生活日趋外化的趋势（齐美尔，2003b：182）。这一趋势源自马克思所称的经济基础的增长，不仅是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开始发生变化，技术的意义和地位同样也在提高[[4]](#footnote-4)。诸如电视、电灯、电话等技术在感官上拓展了人们行为的可能性，这些远程的图像、声音和城市光源等等，使人们能够超出自然生理条件限制的种种范围而进行活动。这些技术手段成为一种“超越界限”而给我们以平时囿于自然生理条件局限性而无法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齐美尔，2003a：4）。但是，这种基于技术的超越并不意味着个人生命的片面性的消弭，反而只有认识到片面性仍然存在，生命超越才有继续进行的可能。

但在齐美尔看来，在现代文明中，大多数领域却将技术的完善当作终极价值，试图在技术中寻找彻底的满足。这种纯技术性手段的外在寄托让生命的价值依附于技术或技术流程而忽略了某些内在的、主观的塑造。以绘画为例，对绘画技艺的旨趣尽管一度产生了有益于创作的影响，但对纯粹画技的追求却占据了艺术家主观精神的表现空间，让绘画成为摄影一般的对客体的忠实描绘（齐美尔，2003b：186）。技艺终究需要服务于主体主观精神世界的表达，只追求技艺的绘画得其现实性而失其艺术性，最终不再具有艺术的特殊功能，这种对客体的狂热追求即齐美尔所说的“外在化”趋势。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绘画上，在科技研究、性别差异乃至教会政权等种种方面都得以体现。这种对主体性的忽略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手段取代目的而成为目的本身，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手段的追求，人的发展成为技术的发展，生命为技术服务。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目的为手段所取代也导致现代生活中价值和意义[[5]](#footnote-5)的缺失。人们试图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找到理解他们的现代生活的答案，但齐美尔将其形容为叔本华式的“对确定价值的渴望”，并且驳斥道，一个社会主义理想的达成竟然需要经过一个和资本主义货币替换所有价值形式，代之以纯粹的数值相同的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差异的“夷平”过程。一个平面化的社会，不仅是不可能的，更是有碍于人类发展的（齐美尔，2003b：205-207）。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共情让社会问题成为了道德问题，社会主义理想的付诸实践要求对现有社会结构的颠覆式改变，也就是一个平整的社会结构。一方面，这种改变和工人阶级的诉求一样，几乎全是物质性的；另一方面，这种改变与齐美尔期望的、由尼采式的贵族及其精神价值引领的理想人类社会背道而驰。故而，齐美尔同样将社会主义看成是社会外在化表现的一部分。然而，齐美尔在生命形而上学中指出了人们处理技术的另一种可能，即以一种与外化趋势相反的、超越技术的视角审视技术，藉此完成生命本身的超越。

# 三、作为界限和目的的技术与生命的紧张

齐美尔认为，生命是一种“无限制的、不断超越局限性的形象”（齐美尔，2003a：11）。他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的。严格的逻辑上的“现在”、“现代”并不存在，或者说，“现代”依附于“现在”存在，它们都只是过去与未来在这一瞬间的交汇，是处于一种已经消逝和尚未存在之间的瞬时的短暂存在。但我们的意识并不能扎根于这样的“瞬间”中，故而，我们能够认识到的“现在”其实包含一部分过去和将来在内。齐美尔同时也指出，生命在包含一部分过去和未来的同时，也为经历过的内容和客观性所限制，生命运动存在自我设定的界限（齐美尔，2003a：11），界限是连续性的形式，生命的连续性恰恰是通过界限以及界限确定的中心点而存在的。生命从下确界到上确界不断变动，最终超越界限而达成自我超越，这即生命连续之所在。在这里，齐美尔用界限指某种范围的结构性边界，好比我们常说的最好和最坏、最高和最低，物理学领域内的真空光速、普朗克常数等等，是“我们熟悉当今世界无限空间的手段”（齐美尔，2003a：1）。

## （一）技术界限及其超越：主体性的唤醒

齐美尔认为，现代技术的出现和使用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感官世界，丰富了人们的认识手段，同样，扩展了生命界限。一个全自然的感官世界是和谐的，但技术打破了这种和谐，人们只有依靠认识的想象来适应这种几乎无限延展的界限（齐美尔，2003a：4-7）。但这种无限延展性的先验基础并不明确，整个世界的可认识性尚未可知。所以，齐美尔指出，我们实际上是用奇绝的想象而非一般的认识来与那些技术带来的远超我们自然生理感官能体验到的世界现实进行交互的，这就是精神生命的自我超越所在（齐美尔，2003a：5）。这种超越，必须首先承认我们的解释能力的局限，把认识的片面性看成生命原则上的界限。此时，我们反而因为意识到片面性的存在而超越了片面性，对这种“界限的界限”的认识就意味着对界限的超越。

而在外在化的趋势中，我们可以想见一种人们执迷于技术界限的状态。一方面，自然主义对经验事实的狂热让人们相信一切事物的真都在于这件事物被技术手段观察、复制和精确呈现的过程；另一方面，外在化趋势对主体精神的排斥让对经验事实之外的内在观察无从下手。这种执迷让人们不能或不愿进行片面性的反思，现代生命则呈现出在界限内凝滞的态势。技术之于人类，在齐美尔的观点里，只是又一个人们主动给自己设置的界限而已，生命的自身超验的运动要求对技术的超越，也就是要求认识到技术的片面性所在。技术所追求的经验真实并不是全部的真实，对事物的最精确的复制和呈现体现的，可能只是浅薄的事物真实，而某种完整无缺的现实体验，反而需要经由从现象中撤离的精神反思和思维建构才能得到（齐美尔，2003b：227），这一撤离就是从外在化趋势中重拾主体性的过程。实现生命对技术界限的“突围”，能且只能通过这一手段来达到。

## （二）合目的性

齐美尔对目的的反思同他在进行生命形而上学研究之前所进行的不同。在进行货币哲学和外在化趋势的论述时，齐美尔指出，包括金钱在内的现代技术（纯粹手段或工具）对生命影响的另一结果，就是技术作为手段和工具取代了目标而成为目标本身，让生命的所有行为为获取技术的完善服务。也就是说，目标为用来达成目标的手段所降格。但在《生命直观》中，齐美尔通过极端化的、作为符号和纯粹手段的金钱来重新审视目的论本身，在这一例证中，金钱只是经济中介，而所有人都以占有金钱为满足（齐美尔，2003a：34）。原本通向其它目的的内容链条因为金钱发生了变动，但这一变动不能被称为是目的链条的断裂：因为链条最后一环的标记本就可以随意志和感情的变化而更改。更进一步地说，齐美尔认为，只有人们全力以赴地对待手段，才有可能攀登目的论的阶梯（齐美尔，2003a：34）。故而，最为理想的目的论形式本身，就在要求手段的合目的性。

但这种合目的性意味着，生命运动将会被目的论束缚在最小手段的活动范围内。而最大的生命的合目的性就是以“下意识动作”为依据的本能（齐美尔，2003a：35），这种本能存在于躯体内部，在生理学机制的制约下作用，这显然不是人们活动的凭依。恰恰相反，人的自由意味着突破合目的性的可能性，生命运动需要超越躯体。目的离生命的下意识越远，超越生命的原始合目的性的趋势就越明显。原则上人是不合目的的，因为“他相对地离开了合目的性，离开了这个存在于基本的下意识，因而也是低级有机体的合目的性中的合目的性”（齐美尔，2003a：36）。

但是，一个超越本能的目的，并不意味着人类价值的所在。一方面，这种目的是本能的延长和继续，另一方面，在对目的链条的分析中，链条彼端可能通往的卑鄙和有害的目的同样在亵渎手段的价值。于是，在目的论意义下，手段和目的的区分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对于技术合目的性的超越，需要被归结到对目的本身的超越上来。“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毫无目的地行动”（齐美尔，2003a：36），如果将行动作为全部行动来理解，生命就处于一种不断超越的“总目的论”之中，并且，上一个目的的达成将成为下一个目的的手段，如此延续，生命只会在目的论的范畴内存在而受到目的性的限制。所以，要获得生命的自由，人类的发展就需要“离开受到它内在体格约束的合目的性的以及一味往行动中延伸的阶段”（齐美尔，2003a：38）。至此，齐美尔对目的的反思导向了对目的本身的超越，金钱、技术与现代生命之间的紧张，可以回到生命本身的运动中去。

# 四、外在化趋势的内部矫正

如果回到齐美尔在生命形而上学之前对现代性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齐美尔似乎一度将现代问题的解决寄望于“问题本身”。就像本文引言所引，“货币体制……自己能够医治由它刺破的伤口”，而社会发展的外在的物质经济力量，也可以搭建其与精神和心理原则的关系。外在化、物质化的生活哲学催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开辟了“将观察历史的方法精神化的道路”（齐美尔，2003b：233）。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社会变迁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强调了经济基础变化在精神上的作用，比如贫穷、饥饿引起的痛苦。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意义上重新发掘了“被压制和忽略的历史事实”（齐美尔，2003b：234）。

齐美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提出了极简的几乎完全刨除精神作用的社会公式后，仍然为历史运动提供了心理精神基础。似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意识到了历史运动的情感凭依，在对历史的外在化、物质化解释的寻求中，历史唯物主义最终会转向“历史图景精神化”（齐美尔，2003b：234）。同时，从外在化的另一个方面而言，“自然主义”的艺术也同时因意识到了在对真实的描摹上极尽技巧之能事，非但不会成为美好，反而会助长丑陋而销声匿迹（齐美尔，2003b：226）。对事物的精确复制不能完全展现事物真实，对事物真实的认识反而需要主观层面上的运作。这是否在暗示，外在化趋势内部其实有矫正外在化的内生力量？

货币、技术作为纯粹手段和符号栖居于现代性之中，又同时具有与历史和现代心理的同构性。经济领域的变动让生命领域经过了原则性的转变，“摆脱了固有的能从中产生其形式的生命连贯性”（齐美尔，2003a：78）而进入了新的生命形式。但是，货币、技术对现代心理和现代文化的外化并没有让生命领域做出同样的原则性转变，而只是在心理重点上做出了转变。实际上，只是经济为生命创造了新的形式，而外在化这一趋势似乎只是生命在形式界限中的运动。但生命本身要求超越这一形式，包括对技术、手段界限片面性的认识在内，超越生命带来了对外在化趋势的矫正。但从另一方面，生命又以矫正外在化趋势的形式（譬如精神化），为自身的表达创造了新的生命形式。这种“由生命自身所创造的合目的性的形式获得了生命的对立面”（齐美尔，2003a：78）。于是，从外在化趋势内部生发出的矫正力量，似乎可以解释成生命本身的运动过程。这种生命由既有形式向新的形式超越的周而复始的过程，恰恰是生命的悲剧性所在。

与马克思不同，齐美尔对现代性的反思出于文化的角度。从上述从货币开始、生命结束的分析似乎可以看出齐美尔思想的连续性，尽管他对目的论的分析似乎出现了转变，但还是具有明显的前后关联。在这种关联中，可以注意到货币-技术-生命（文化）链条的存在，并且最终遵循他的生命悲剧的观点，在现代化与外在化之后，生命仍然会面临形式和界限的困境，我们似乎将永远处在某种“现代性的症结”之内，没有悲剧性的调和存在。

参考文献

西美尔,2003a,生命直观:先验论四章[M],刁承俊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西美尔,2018.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

夏出版社.

西美尔,2000.现代文化中的金钱[G],阮殷之译//金钱、性别、

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上海:学林出版社.

西美尔,2003b,附录:1870年以来德国生活与思想的趋向[G]//

宗教社会学,曹卫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弗雷司庇,2000.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G],阮殷之译//金钱、

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上海:学林出版社.

评语：从货币、技术与生命的关系入手，来呈现齐美尔的现代性思考比较新意，但货币与技术分别在齐美尔的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货币-技术-生命”的准确性，都需要再深入辨析和讨论。

1. 指货币经济现象和时代历史潮流的形式上的相似和统一。 [↑](#footnote-ref-1)
2. 或“界线”，下同。 [↑](#footnote-ref-2)
3. 齐美尔在针对现代人对货币的态度时，做了更细致的区分，比如现代犬儒主义者、厌腻者、享乐主义者等等，对于他们而言，生命不一定是某种“空无”。这里指的是在货币作为纯粹手段成为目的之后，对货币的占有作为对纯粹手段的占有的生命内容上的“空虚”。 [↑](#footnote-ref-3)
4. 齐美尔似乎有意将人们对技术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上层建筑分离开来，并且把上层建筑指代的范围限定在中产阶级的“审美”和“旨趣”上，见《18世纪以来德国生活和思想的趋向》，载于《宗教社会学》第184页。 [↑](#footnote-ref-4)
5. 指“支配整个生活的理想”，见《1870年以来德国生活和思想的趋向》，《宗教社会学》第195页。 [↑](#footnote-ref-5)